

● 卷头语

寻求跨文化对话的话语

乐黛云

《跨文化对话》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近十年来欧洲和中国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强烈愿望。

早在1991年3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就曾以“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为题，与中山大学合作，在中国召开了第一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6月，更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为题在北京大学召开；1996年6月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文化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讨论会。几次会议虽然都很成功，而且也出了中、外文版论文集，但大家总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有一个园地，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于是，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创办《对话》学刊的设想。同年8月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三方就学刊的宗旨、组稿和出版进行了初步磋商。1997年5月召开于北大的以“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为题的第四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更明确地作了具体协商。当年7月在巴黎近郊的维拉苏古堡召开了中欧合作出版会议，确定了包括《跨文化对话》在内的一系列具体撰写计划。今天，在许多朋友的支持下，《跨文化对话》终于有了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开始。

所谓“志同道合”者是指围绕这几次会议聚集起来的一批中国和欧洲学者,他们大抵不赞成在“全球意识”的掩盖下,实现所谓世界文化的“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认为这些说法多半只是某种“中心论”的变种。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展和发现自己。他们认为,目前,西方文化体系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一个“他者”,以使用一种“非我的”、“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设限”,寻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在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之后,也急需在新的基础上,在与西方的平等对话中,更新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完成自己的文化现代转型。因此,东西方文化对话实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历史要求。

两种文化的接触最便捷的方式是直接对话。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然而,长期以来,发达世界习惯于西方中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要以平等的心态去理解他种文化的陌生的话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是发达世界早已长期构筑完成的一整套概念体系,也就是一套遍及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长期占统治地位并被广泛运用的话语。事实上,这套话语经过数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于人类各种问题的思考,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然而,危险的是,如果第三世界只用这套话语构成的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会因不能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排斥在外。由于这种矛盾,某些人就主张去“发掘”一种绝对属于本土的、未经任何“污染”的话语,但他们最后会发现这种话语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文化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况且,即便有这样的完全“本土”的话语,它也不能为对方所理解而达到沟通的目的。

看来,要进行真正的对话,就必须找到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充分表达双方的独创和特色,并足以突破双方的旧体系,为双方提供新的立足点来重新观察自己,为“更新”和“重建”构成前提和可能。这个中介或许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不同的文化

体系多么复杂,无论人类多么千差万别,但从客观来看,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必然会面对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如关于未来和平发展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还有“死亡意识”、“人类末日”、“乌托邦现象”、“遁世思想”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取舍与诠释,只有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最圆满的解答,并向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在这一过程中,能够相互理解的话语也许就会逐渐形成。

这一辑《跨文化对话》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首先汇集了1997年关于“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的讨论,对话中心环绕着文化冲突、生物学发展与伦理道德以及电脑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此外,“学者对话”专栏中,有“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和“历史与记忆”两个问题的对话。“学者论坛”方面,重新发表了Umberto Eco教授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这是他在过去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但仍然很有现实意义。陈方正教授的论文以中国为参照系讨论了何以现代科学首先发生在西方的问题。Alain Rey和张世英教授讨论了术语和语言遗产的问题。同时,我们在“学术动态”栏目中推出了中欧合作的重大项目——关于中欧“关键词”研究的计划。庞朴教授的《道家的玄思与先民的纺轮》是一篇富于睿智、极有趣味的短文,我们很希望将来能多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另外,法国汉学耆宿艾田蒲教授所写《中国之欧洲》的中译者钱林森教授写的关于该书的书评也很值得一读。

我们想做的事很多,我们的目标也很远大,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这毕竟是开始。